

· 民族国家共同体研究 ·

埃塞俄比亚族群历史等级结构的形成 及其当代影响*

王 涛 黄世顺

内容提要 埃塞族群的历史等级结构框定了国内各族群权力关系，其固有的对立与零和博弈思维深刻影响了埃塞国家整合进程，成为理解当前埃塞族群冲突的重要切入点。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埃塞国家疆域定型期，所罗门王朝将不同群体纳入共同的政治空间，塑造了以阿姆哈拉人为中心的族群等级结构。当时，阿姆哈拉人是国家主导精英，提格雷人是地方精英，奥罗莫人是王朝臣民，索马里人是被征服的“敌人”。20 世纪初，“精英—臣民—敌人”差异推动了不同群体身份的族裔化。海尔·塞拉西皇帝推行强制同化政策，引发其他族群反抗。德格政权试图以国家为中心消除族群界限，但族群离心倾向加剧催生了各种族群武装团体。提人阵推翻德格政权后，推行民族联邦制，将族群身份制度化，族群自治意识增强。不过，提人阵对权力的长期垄断引发其他族群不满。2018 年总理阿比·艾哈迈德执政后，打击族群分离势力，推行政治改革，倡导泛埃塞主义与族群和解，致力于消除族群历史等级结构的影响。

关键词 民族国家建构 埃塞俄比亚 族群历史等级结构 阿姆哈拉化 民族联邦制 泛埃塞主义

作者简介 王涛，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世顺，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博士生。

历史悠久的非洲大国埃塞俄比亚（简称“埃塞”）自 1991 年埃塞俄比亚

* 本文系全国影响力建设智库专项重大课题“全球南方视域下中非共建现代化路径研究”（ZKZD202401）的阶段性成果。

人民革命民主阵线（简称“埃革阵”）执政以来，逐步恢复社会秩序与政治稳定。随着国家重建完成与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深入推进“发展型国家”战略，埃塞经济实现高速增长。2004～2015 年经济增长率年均达到 10%，被誉为非洲“增长奇迹”。^① 2018 年 4 月新总理阿比·艾哈迈德（Abiy Ahmed）上任后提出“新埃塞愿景”，试图续写发展辉煌。^② 但埃塞国内族群矛盾已呈现日益激化之势。以往主导埃革阵的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PLF，简称“提人阵”）不满对联邦影响力的丧失，于 2020 底挑起提格雷战争。2023 年初，曾支持阿比的阿姆哈拉特种部队反对联邦与提人阵妥协，也与政府军爆发冲突。2024 年以来，提人阵内部因权力分配产生分歧，央地冲突以及地方内部冲突叠加。^③ 其他地区族群暴力事件的频率也显著增加。埃塞政治稳定与社会经济发展遭遇严峻挑战。

为何埃塞在经历 30 年政治总体稳定与经济持续增长后仍出现波及全国的族群冲突？有学者将其归咎于埃革阵引入民族联邦制、赋予各族群自治权，诱发了更多的地方民族主义乃至分离情绪。正是制度缺陷使各族精英都更热衷政治与经济上的“族群生意”。^④ 这种观点具有启示价值，但忽视了民族联邦制出台时埃塞的历史环境，以及该制度试图通过向各族群赋权来调和族群矛盾的探索性努力。实际上，族群矛盾与冲突贯穿帝制、德格（Derg）、埃革阵时期，历届政府也都提出解决族群问题的思路与方案。把当前冲突诿过于埃革阵及其施行的民族联邦制，忽视了埃塞族群问题的历史根源。同样，它将埃塞族群问题与制度设计的复杂互动关系简化为民族联邦制导致族群冲突，遮蔽了部分历史真相。

独立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多数国家的族群问题源自殖民地边界划分及其

① Jan Prieue, *Ethiopia's High Growth and Its Challenges, Causes and Prospects*, Berlin: Berli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16, pp. 1–2.

② Tomomi Tokutori, “How Prime Minister Abiy Envisions ‘New Ethiopia’: Moving towards People’s Reconciliation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Mitsui & Co. Global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Monthly Report*, 2019, pp. 1–4.

③ “Tigray Interim Admin Accuses Some Leaders of Tigray Military Forces of Dismantling Local Gov’t Structures, Warns of Severe Crisis”, *Addis Standard*, February 21, 2025, <https://addisstandard.com/tigray-interim-admin-accuses-some-leaders-of-tigray-military-forces-of-dismantling-local-govt-structures-warns-of-severe-crisis>, 2025–02–12.

④ Jon Abbink, “The Looming Spectre: A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Emergency’ in Ethiopia, 1970s–2021”, in Jean–Nicolas Bach et al.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Horn of Africa*,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pp. 308–310.

对原有族群边界的破坏,新生非洲国家无法妥善处置被强行“捏合”进一国的族群关系。对这些国家来说,国内族群缺乏必要交流与融合,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错位。^①但埃塞有其特殊性。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且未被殖民的非洲国家,埃塞在2 000多年历史中不断扩大疆域,吸纳并融合多元群体。其一,疆域扩大导致主导群体扩散与内部分化,出现相互竞争的族群。疆域扩大使原先单一语言文化群体逐渐产生地域分化,这种分化伴随着权力、资源分配不均与竞争,不同权力利益诉求促成差异化身份认同。^②其二,疆域扩大,新群体加入,主导群体能有效调控群体间关系。疆域扩张是一个反复拉锯的过程。历经数世纪博弈,主导群体通过与新群体上层分享政治经济权力,逐步吸纳、融合新群体,从而有效整合新领地。^③其三,疆域扩大,但主导群体无法有效吸纳新群体。国家对一块领地的快速兼并往往缺乏前期准备,对新群体的吸纳尚需时日,短期多采用暴力镇压手段,导致对抗性身份认同。^④上述3种情况在埃塞历史上都曾出现。无论群体分化还是新群体加入,都是作为非洲本土国家的埃塞向现代转型的阶段性产物。在此过程中,埃塞发展出一套相对稳定的用于界定族群关系、规定族群权力地位的模式,族群结构逐渐成形。

族群结构既包括物理空间结构,也包括历史政治结构,指在国家形成与整合过程中,不同族群界定自身社会、政治、经济地位,进而规定族群关系的基本框架及其动态调整。等级性与不平等乃是其中常态,因而族群历史结构通常都是历史等级结构。该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时期合作或冲突的族群关系。鉴于族群结构具有内在稳定性与锁定效应,因而还对当前一国族群关系造成影响。^⑤埃塞族群历史等级结构就隐含了当前族群冲突的深层原因,它同样为理解埃塞政治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及其限度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本文首先探讨20世纪以前埃塞族群历史结构的形成过程,随后分析孟尼利克二世(Menelik II)时埃塞族群历史结构的等级特征。这种等级结构很大

① 刘鸿武:《撒哈拉以南非洲民族国家统一构建进程》,载《西亚非洲》2002年第2期,第16~21页。

② Andreas Wimmer,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Ethnic Boundaries: A Multilevel Process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13, No. 4, 2008, pp. 986–989.

③ J. Milton Yinger, “Toward a Theory of Assimilation and Dissimilation”,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4, No. 3, 1981, pp. 251–254.

④ Charles S. Spencer, “Territorial Expansion and Primary State Form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107, No. 16, 2010, pp. 7119–7126.

⑤ 包刚升:《21世纪的族群政治:议题、理论与制度》,载《世界民族》2017年第5期,第5~6页。

程度上影响了此后埃塞的族群关系，历届政府都试图从这种结构中“突围”，但顽固的历史等级结构至今仍具有强大影响。正基于此，本文既回溯历史，又审思当下。事实上，2018 年以来，阿比政府意识到埃塞国内族群关系问题的严峻性，在打击族群分离主义、建立包容性政治、推进经济发展成果共享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一 埃塞族群历史等级结构的形成

非洲之角地区讲闪米特语（Semitic）、库希特语（Cushitic）的主要群体在历史上的互动推动了埃塞国家的发展。各群体间的政治博弈、文化碰撞与地缘竞争推动了群体的融合与分化，在推动埃塞国家疆域最终定型的同时，塑造了群体间的等级关系，奠定了埃塞族群历史等级结构的基础。^①

（一）锻造精英：提格雷人与阿姆哈拉人的分化

提格雷人（Tigray）与阿姆哈拉人（Amhara）是埃塞历史发展进程中两个主导了国家构建的核心群体。^② 19 世纪中后期，在争夺国家主导权的斗争中，两群体走向分化、对立。孟尼利克二世最终确立阿姆哈拉人“统治精英”的地位，提格雷人逐渐被边缘化与属地化。^③

在早期记载中，两群体都被称为阿比西尼亚人（Abyssinians）。^④ 他们都

① 20 世纪 90 年代埃塞推行民族联邦制，宪法将“长时间居住在可确认的、明显的疆域内的拥有共同文化或相似习俗……拥有互相理解的语言，有共同的身份认同和心理共识”的一群人定义为“民族”（第 39 条）。但从近 30 年埃塞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到，很多大致符合这些标准的群体在埃塞没有被认定为“民族”，他们还在为自己的“民族”身份不断抗争；而另一些不同“民族”间的上述差异却并不明显。加之“民族”带有国族含义，因此本文只有在提到民族联邦制、民族州等埃塞官方规定用语时使用“民族”。孟尼利克二世完成国家整合以前，本文以“群体”指代埃塞国内各人群单位；在其统治后期埃塞族群历史等级结构成型，各群体有了族裔身份、族群意识，本文即以“族群”指代各人群单位，以“地方民族主义”指代各族群以自身为中心、追求自治乃至分离的政治理念。有关概念辨析请参见李安山：《论中国非洲学研究中的“部族”问题》，载《西亚非洲》1998 年第 4 期，第 65 页；蒋俊：《部落、部族、族群与民族：非洲研究中主要人群概念的辨析与定位》，载《世界民族》2020 年第 5 期，第 77～88 页；张湘东：《埃塞俄比亚联邦制：1950—2010》，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 年版，第 211 页。

② 肖玉华著：《当代埃塞俄比亚政治进程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 40 页。

③ 施琳、牛忠光：《埃塞俄比亚民族关系与民族治理研究》，载《西亚非洲》2013 年第 4 期，第 22 页。

④ William A. Shack, *The Central Ethiopians, Amhara, Tigriña and Related Peoples: North Eastern Africa Part IV*, London: Routledge, 2017, p. 15.

是南阿拉伯闪米特人与埃塞北部库希特人混血的后裔，定居在青尼罗河谷与厄立特里亚高地之间。早期阿比西尼亚人高层通行闪米特语。^① 随着人口增多、贸易范围扩大，他们逐渐向南扩张至绍阿（Shoa）。人群迁移促使语言分化。至少在阿克苏姆（Axum）兴起 300 多年前，生活在厄立特里亚、提格雷高地的群体就开始使用闪米特语北支吉兹语（Ge'ez）、提格雷尼亚语（Tigrinya），而从塔纳湖（Tana）、阿瓦什河（Awash）上游到绍阿一带的群体则使用闪米特语南支阿姆哈拉语（Amharic）、加法特语（Gafat）、古拉格语（Gurage）。^② 日后提格雷人与阿姆哈拉人的分野由此产生。

公元 1 世纪，阿克苏姆王国以北方为统治中心，王国精英皈依基督教，吉兹语为教会语言。6~7 世纪，因贝贾人（Beja）骚扰与红海贸易衰退，统治中心向南转移，特克泽河（Tekeze）下游阿姆哈拉、塔纳湖以西戈贾姆（Gojjam）以及阿巴伊河（Abay）南部绍阿等地在重要性上逐渐超过北方提格雷高地。^③ 1270 年，绍阿领主耶库诺·阿姆拉克（Yekuno Amlak）推翻阿高人（Agew）的扎格维王朝（Zagwe），恢复“所罗门世系”，这可视为南方人掌握埃塞国家权力的开始。^④ 通过制造所罗门王（Solomon）与示巴女王（Sheba）后裔的传说，阿姆哈拉人与提格雷人共享阿克苏姆继承者身份。^⑤

18 世纪至 19 世纪初，皇帝仅是名义上的“万王之王”，提格雷、阿姆哈拉与绍阿三地领主分割了国家权力。1855 年，取得阿姆哈拉统治权的卡萨·海卢（Kassa Hailu）称帝，即提沃德罗斯二世（Tewoderos II）。提格雷则由卡萨·默察（Kassa Mercha）统治，依托北方红海贸易积聚实力。当提沃德罗斯二世与英国冲突时，卡萨·默察却与后者合作，向其提供补给。^⑥ 绍阿长期由阿姆哈拉萨尔·马利安家族（Sahle Maryam）统治，控制帝国南部边区，主要防范北上的奥罗莫人。

① Harold G. Marcus, *A History of Ethiop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p. 3-4.

② [塞内加尔] D. T. 尼昂主编：《非洲通史（第四卷）：十二世纪至十六世纪的非洲》，张文淳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1992 年版，第 351~352 页。

③ [英国] 理查德·格林菲尔德著：《埃塞俄比亚新政治史》，钟槐译，商务印书馆，1974 年版，第 45 页。

④ G. W. B. Huntingford, "The Wealth of Kings' and the End of the Zāguē Dynasty",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28, No. 1, 1965, pp. 2-4.

⑤ Harold G. Marcus, *A History of Ethiopia*, p. 16.

⑥ [美国] 萨义德·阿德朱莫比著：《埃塞俄比亚史》，董小川译，商务印书馆，2009 年版，第 33 页。

1868 年提沃德罗斯二世战死，阿姆哈拉与绍阿势力合流，与北方提格雷领主对峙。1872 年卡萨·默察称帝，即约翰尼斯四世（Yohannes IV）。为了换取南方领主承认，他册封萨尔·马利安为绍阿国王，即后来的孟尼利克二世，给予其在南方独立统治权。^① 约翰尼斯四世统治重心在北方，积极向红海地区扩张；作为英国盟友，他还卷入对马赫迪国家的战争。孟尼利克二世则南下蚕食奥罗莫土地以充实自身力量，并与意大利人结盟以制衡约翰尼斯四世。1889 年约翰尼斯四世在与马赫迪的冲突中丧生，孟尼利克二世继位为埃塞皇帝。

孟尼利克二世统治期间，通过“精英整合”，打造了一个认同所罗门王朝政权、共享权力与利益的统治精英群体。他运用联姻、封爵、封土等手段，将提格雷、奥罗莫等地方精英纳入帝国权力网，塑造了以阿姆哈拉人为核心的“精英族群”。其身份认同突破了血缘、地域，更多取决于对王室的效忠。例如，提格雷贵族塞尤姆·加布雷·基丹（Seyoum Gabre Kidan）因支持王室而成为提格雷的阿姆哈拉总督；曼加夏·约翰尼斯（Mengesha Yohannes）虽是前皇帝约翰尼斯四世之子，但因抵制孟尼利克而沦为提格雷“叛逆”。^② 权力决定身份，忠于孟尼利克的各类精英结成阿姆哈拉政治共同体。

为了削弱提格雷贵族力量，孟尼利克二世在南方新征服土地上分封大批阿姆哈拉贵族，并在奥罗莫地区营建新都亚的斯亚贝巴，竭力使提格雷人远离权力中心。^③ 1889 年，他与意大利人订立《乌查理条约》（*Treaty of Wichale*），将提格雷北部博戈斯（Bogos）、哈马森（Hamasen）等地划给意属厄立特里亚，切断了提格雷人联通红海的资源渠道。^④ 1896 年，在阿杜瓦战役（Battle of Adowa）期间，孟尼利克二世放任意军劫掠提格雷地区；战后继续承认意大利对整个红海沿岸的占领。提格雷地区沦为埃塞与意属厄立特里亚之间的战略缓冲带。

在埃塞国家疆域南扩的过程中，阿比西尼亚人分化出相互竞争的提格雷人与阿姆哈拉人。双方同为埃塞文明缔造者，围绕国家主导权进行了长期博弈。19 世纪末，孟尼利克二世最终胜出，完成南方阿姆哈拉人对国家权力的

① Heran Sereke - Brhan, *Building Bridges, Drying Bad Blood: Elite Marriages, Politics and Ethnicity in 19th and 20th Century Imperial Ethiopia*, PHD. Dissertatio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2002, pp. 94 - 95.

② Heran Sereke - Brhan, “‘Like Adding Water to Milk’: Marriage and Politics in Nineteenth - Century Ethiopi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 38, No. 1, 2005, pp. 49 - 50, 62.

③ [英国] 理查德·格林菲尔德：《埃塞俄比亚新政治史》，第 180 ~ 189 页。

④ Harold G. Marcus, *A History of Ethiopia*, pp. 89 - 91.

垄断。根据归附与效忠程度,以政治立场为依据的族群身份最终形成,出现了主导埃塞统治权的阿姆哈拉人及与之对抗的地方竞争者提格雷人。

(二) 吸纳臣民:被征服的奥罗莫人及其融入

奥罗莫人是埃塞国家扩张中的外围群体。在阿姆哈拉人进一步向南扩张的过程中,与奥罗莫人进行了数世纪拉锯,期间奥罗莫人一度占据上风,但阿姆哈拉人取得最终胜利,吸纳了大片奥罗莫土地与人口。由于阿姆哈拉人承担了征服奥罗莫人的任务,由此,奥罗莫人成为充实阿姆哈拉人力量并最终压倒提格雷人的资源。在此过程中,阿姆哈拉人与奥罗莫人文化相互借鉴,高层相互通婚,数位埃塞皇帝的母族都出身奥罗莫贵族。奥罗莫上层加入所罗门王朝权力网并逐渐阿姆哈拉化,大量底层奥罗莫人则沦为农奴。

库希特语族一支的奥罗莫人早期可能生活在埃塞南部阿巴亚湖(Abaya)与查莫湖(Chamo)一带。^①作为游牧群体,奥罗莫人生计以牛为中心并形成“盖达”(gada)体系。他们按年龄段划分,将男性分为权力与分工各异的盖达组。其中,掌握议事大权的盖达组须在任内(8年左右)至少发动一次远征,以锤炼群体战斗意志与尚武精神。^②

16~18世纪,奥罗莫人通过盖达远征向埃塞东、中部地区扩张,填补了埃塞与阿达勒(Adal)苏丹国博弈后留下的政治真空。奥罗莫人与阿姆哈拉人互动日益密切。17世纪初,王子苏塞尼奥斯(Susenyos I)在奥罗莫人支持下成为埃塞新皇。作为回报,奥罗莫人占领了大量东正教会土地。^③“王子纷争”(Zamana Masafent)时期,阿姆哈拉贵族为了自保与发展,频繁与奥罗莫上层通婚。戈贾姆领主海卢公爵(Ras Haylu)将女儿许配给奥罗莫扎乌迪侯爵(Dajazmach Zawde),维持与奥罗莫亚朱王朝(Yajju dynasty)的友好关系。瓦桑·萨加德(Wasan Sagad)在绍阿的领地紧邻奥罗莫人,因而任命一大批奥罗莫官员以稳定统治。其子萨赫拉·塞拉西(Sahla Sellase)统一绍阿后仍保留与奥罗莫上层通婚的传统。^④

① Herbert S. Lewis, "The Origins of the Galla and Somali",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7, No. 1, 1966, pp. 32-33.

② [肯尼亚] B. A. 奥戈特主编:《非洲通史(第五卷):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的非洲》,李安山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562页。

③ Tsega Etefa, *Integration and Peace in East Africa: A History of the Oromo N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p. 16-29.

④ [尼日利亚] J. F. 阿贾伊主编:《非洲通史(第六卷):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非洲》,张文淳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81~282页。

这一时期, 尽管奥罗莫人占据军事优势, 但其上层文化逐渐阿姆哈拉化。^① 19 世纪, 随着埃塞国家实力恢复, 奥罗莫人逐渐被视为文化水平低、未开化的异教徒, 即“盖拉人”(意为“奴隶”)。^② 孟尼利克二世时, 同时掌握军事优势与文化霸权的阿姆哈拉人开始规定奥罗莫人身份, 后者内部出现“像阿姆哈拉人一样行事的人”与“像奥罗莫人一样行事的人”。^③

一方面, 奥罗莫上层的地位得到提升并稳固, 完成阿姆哈拉化。19 世纪, 随着提格雷人与阿姆哈拉人帝位竞争的白热化, 后者不断吸纳奥罗莫军事力量以壮大自身; 奥罗莫上层由此加入埃塞南方精英权力网。绍阿国王萨尔·马利安母族就是奥罗莫人, 他在母族支持下对抗提格雷人。孟尼利克二世称帝后, 奥罗莫上层陆续皈依东正教。例如, 瓦洛 (Wallo) 与绍阿的奥罗莫领主穆罕默德 (Muhammad) 与阿玛德 (Amadé) 原为穆斯林, 这一时期改宗并分别更名为米卡勒与海卢·马利亚姆 (Haylä Maryam)。^④ 沃勒加 (Wallaga) 领主库姆萨 (Kumsa) 受洗后改名盖布雷·艾吉扎比尔 (Gebre Egziabher), 并转用阿姆哈拉语。^⑤ 奥罗莫上层还担任为皇帝镇守地方的“巴拉巴特” (balabbat)。^⑥ 季马 (Jimma) 的奥罗莫领主阿巴·吉法尔二世 (Abba Jifar II) 曾协助孟尼利克二世进攻锡达莫人 (Sidama), 其后代因功世袭家族领地。^⑦ 瓦洛奥罗莫贵族米卡勒与孟尼利克二世长女沙瓦·雷加 (Shewa Regga) 联姻后得封“公爵”, 其子伊雅苏 (Lij Iyasu) 后来还继位为帝。^⑧

另一方面, 多数奥罗莫人沦为埃塞国家军事扩张与经济掠夺的牺牲品,

① Donald N. Levine, *Greater Ethiopia: The Evolution of a Multiethnic Socie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0, pp. 79–80.

② 罗圣荣:《埃塞俄比亚奥罗莫人问题的由来与现状》, 载《世界民族》2015 年第 1 期, 第 62~69 页。

③ Brian J. Yates, “From Hated to Häbäsha: Oromo Identity Shifts in Wallo and Shäwa during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frican Identities*, Vol. 14, No. 3, 2016, p. 203.

④ Brian J. Yates, “Acculturation in the Däga: Local Negotiations in Amhara/Oromo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opian Studies*, Vol. 5, No. 2, 2010–2011, pp. 99–100.

⑤ [英国] 理查德·格林菲尔德:《埃塞俄比亚新政治史》, 第 201 页。

⑥ Teshale Tibebe, *The Making of Modern Ethiopia: 1896–1974*, Trenton: The Red Sea Press, 1995, pp. 42–43.

⑦ John Markakis, *Ethiopia: Anatomy of a Traditional Po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4, pp. 104–105.

⑧ Éloi Ficquet and Wolbert G. C. Smidt eds.,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j Iyasu of Ethiopia: New Insights*, Berlin: LIT Verlag, 2014, p. 195.

他们与阿姆哈拉人的身份对立不断凸显。^① 孟尼利克二世南下征服奥罗莫人后,将当地土地与人口授予阿姆哈拉军人,后者留在当地担任巴拉巴特。这一举措巩固了埃塞对南方新征服土地的控制,使其有能力在 19 世纪末欧洲瓜分非洲的浪潮中幸存,不过也形成了阿姆哈拉人统治奥罗莫人的结构。后者备受巴拉巴特剥削,是领地上无权的臣民,是阿姆哈拉人眼中的“盖拉人”。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大批奥罗莫农奴皈依伊斯兰教,对抗埃塞统治者压迫与东正教文化渗透。伊斯兰化也加速了奥罗莫族群身份的形成。

(三) 战胜“敌人”:被纳入埃塞疆域的索马里人及其反抗

阿姆哈拉人与奥罗莫人有 500 多年的互动,其中不乏通婚、联盟,但 19 世纪末埃塞对索马里人的征服则显得简单粗暴。有学者甚至把埃塞对欧加登(Ogaden)的占领看作“瓜分非洲”的一部分。^② 索马里人被纳入埃塞国家的过程没有太多融合的元素,更多表现为对“异族”索马里人的征服。后者不接受埃塞政府统治,期待联合其他索马里人共同组建一个大索马里国家。

欧加登地区生活着近 30 个索马里氏族,其中达鲁德(Darod)氏族欧加登亚氏族在人口上占多数。^③ 早在公元前 1000 年他们就驱逐了当地奥罗莫人,占据了欧加登牧场。^④ 以血缘为基础,索马里人根据习惯法(xeer)明确群体共同义务与惩罚机制,团结各氏族,形成相对平等的政治关系。^⑤ 氏族大会与长老委员会负责处理日常事务,解决纠纷。^⑥ 7 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后,索马里人将自身起源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将谱系血统与宗教道统合二为一,强化了族群身份。^⑦ 14 世纪以来,埃塞与索马里人冲突日益频繁。索马里伊法特(Ifat)苏丹国(Ifat)定都非洲之角商品物流集散地泽拉(Zeila),形成钳制

① 钟伟云:《埃塞俄比亚的民族问题及民族政策》,载《西亚非洲》1998 年第 3 期,第 24~29 页。

② Abbas H. Gnamo, *Conquest and Resistance in the Ethiopian Empire 1880 - 1974: The Case of the Arsi Oromo*, Leiden: Brill, 2014, pp. 113 - 114, 131 - 139.

③ David Carment, *Who Intervenes?: Ethnic Conflict and Interstate Crisis*,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75 - 76.

④ Tibebe Eshete, "Towards a History of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Ogaden: 1887 - 1935", *Journal of Ethiopian Studies*, Vol. 27, No. 2, 1994, p. 70.

⑤ I. M. Lewis, *A Pastoral Democracy: A Study of Pastoralism among the Northern Somali of the Horn of Afric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127 - 128.

⑥ 王学军:《重新理解传统氏族制度:索马里国家重建的社会逻辑及其限度》,载《世界民族》2020 年第 5 期,第 68~69 页。

⑦ 闫伟:《索马里的伊斯兰化与阿拉伯认同的历史起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 年第 6 期,第 113 页。

埃塞之势。沿哈勒尔（Harar）至泽拉一线的战事持续百年。16 世纪，阿达勒苏丹国在伊玛目艾哈迈德·格兰（Ahmed ibn Ibrahim al - Ghazi, Gran）带领下多次发动对埃塞的“圣战”，欧加登游牧民被进一步团结起来。1529 ~ 1533 年，格兰一度占领绍阿、瓦洛的阿姆哈拉领地并摧毁埃塞皇帝登基地玛丽亚天国大教堂（Maria Zion cathedral）。^① 在阿拉伯史书中，这一时期被称为“征服阿比西尼亚”。格兰成为穆斯林特别是索马里人眼中的英雄；而在埃塞史书中，他则以“死敌”的形象出现。^② 在与埃塞漫长的对抗中，索马里人不断借外敌强化自身族群认同，这导致埃塞基督徒与索马里穆斯林之间出现身份鸿沟。

19 世纪末，索马里土地遭到意、英、法殖民者瓜分，埃塞也趁机向邻近索马里地区扩张。1887 年，时为绍阿国王的孟尼利克占领商业重镇哈勒尔。1891 年，孟尼利克二世着手征服欧加登。1897 年他与英国订约，后者承认埃塞对欧加登的占领。不过，埃塞缺乏整合欧加登的意愿，只是将其作为防御欧洲殖民者的缓冲区，偶尔从哈勒尔或吉吉加（Jijiga）派军向索马里各氏族暴力征缴贡赋或讨伐叛乱。^③ 索马里各氏族长老名义上担任埃塞巴拉巴特，但享有很大自主权。^④ 1899 年，出身欧加登氏族的穆罕默德·哈桑（Mohammed Abdilleh Hassan）不承认英国、意大利与埃塞订立的条约，发起长达 20 年的“德尔夫希运动”（Dervish）。哈桑与英属索马里兰祖拜尔氏族（Zubeir）联姻，频繁袭扰埃塞对外商道。到 1913 年孟尼利克二世去世时，哈桑在沃尔代尔（Wardheer）、科拉赫（Korahe）等地的统治已十分稳固。^⑤ 1917 年，奥斯曼帝国册封哈桑为索马里埃米尔，进一步赋予其合法性。^⑥ 一战后，欧加登人寻求意大利人支持。1931 ~ 1933 年，意大利殖民者向欧加登长老、宗教领袖

① [肯尼亚] B. A. 奥戈特主编：《非洲通史（第五卷）：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的非洲》，第 559 页。

② Paul B. Henze, *Layers of Time: A History of Ethiop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pp. 86 - 88; Yohannes K. Mekonnen, *Ethiopia: The Land, Its People, History and Culture*, Cape Town: New Africa Press, 2013, p. 37.

③ Tibebe Eshete, "Towards a History of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Ogaden: 1887 - 1935", *Journal of Ethiopian Studies*, Vol. 27, No. 2, 1994, pp. 75 - 76.

④ John Markakis, *Ethiopia: The Last Two Frontiers*, New York: James Currey, 2011, p. 141.

⑤ Lotje de Vries, Pierre Englebert and Mareike Schomerus eds., *Secessionism in African Politics: Aspiration, Grievance, Performance, Disenchantment*,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p. 96 - 97.

⑥ Robert Gerwarth and Erez Manela eds., *Empires at War: 1911 - 192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48.

提供军事援助。在随后意大利入侵埃塞的战争中, 哈维耶 (Hawiye) 氏族长老欧勒尔·狄雷 (Olel Dinleh) 配合意军骚扰埃塞军队。^① 1941 年意大利战败, 英国把欧加登与其他索马里地区合并, 实施统一管理, 1946 年还提出支持建立大索马里国家的“贝文计划” (Bevin Plan)。此举调高了欧加登索马里人的期待值, 鼓励了旷日持久的分离主义运动, 进一步加剧与埃塞的隔阂。^② 埃塞对欧加登的统治不稳定、时断时续, 当地索马里人并非所罗门王室臣民, 仅是充满敌意的“异教徒敌人”和“被征服者”, 是埃塞族群结构中最外围的离心元素。

总之, 在埃塞国家疆域不断扩张的过程中, 各个群体先后被纳入。19 世纪末, 不同社会等级逐渐固化为族群, 并发展为埃塞族群的等级结构。它脱胎于所罗门王朝下的等级制, 形成族群关系与社会等级关系交叉、重叠的特征, 这使埃塞族群结构具有内在稳定性, 因而增加了历届政府的改造与治理难度。族群历史等级结构对埃塞族群关系、政治格局、社会秩序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二 埃塞族群历史结构的等级性及其互构

埃塞国家疆域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最终定型, 国家建构也在这一时期起步。阿姆哈拉统治精英将各群体纳入一个共同的政治空间。他们在埃塞国内身份各异, 或是统治者或是臣民, 但从来都不是埃塞国民。在这个扩张型封建国家中, 人群在等级结构中的位置反映了与政权的亲密程度以及进入权力高层的可能性。其中阿姆哈拉人是“主导精英”, 提格雷人也是统治精英来源, 但属于“被防范群体”, 是“地方精英”; 奥罗莫人是“臣民”, 索马里人是“敌人”。20 世纪以来, 不同群体在自我审视与互构中逐渐将彼此政治等级关系转化为族群关系。

“精英群体”阿姆哈拉人主导了埃塞族群历史结构的形成, 将“等级即身份”的秩序观应用于族群身份界定上。提沃德罗斯二世时期, 阿姆哈拉语在教会与官方文书中逐步取代吉兹语, 成为具有排他性的“国王语言”。^③ 孟尼

^① Tibebe Eshete, “Towards a History of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Ogaden: 1887 – 1935”, pp. 79 – 82.

^② 王涛、赵跃晨:《泛索马里主义的历史渊源与流变》, 载《世界民族》2018 年第 4 期, 第 40 ~ 52 页。

^③ Richard Pankhurst, “Tedla Hailé, and the Problem of Multi – Ethnicity in Ethiopia”, *Northeast African Studies*, Vol. 5, No. 3, 1998, pp. 81 – 83.

利克二世以来,一群享有政治权力、经济资源与社会地位的人在既得利益基础上形成具有持久认同的族群共同体,以往指代社会等级的阿姆哈拉人成为族群名称。作为族群的阿姆哈拉人,将祖先追溯到史诗《众王之荣耀》(Kebra Nagast)中示巴女王与所罗门王的后裔孟尼利克一世。他们因信仰(东正教)、血统(所罗门)、族群(阿姆哈拉人)的优越性而具有统治国家的权力,^①阿姆哈拉人就此与埃塞统治合法性绑定。具体而言,信仰使阿姆哈拉人继承了犹太人“上帝选民”的神圣属性;“基督徒等于阿姆哈拉人”;而他们的中央集权制与官僚文化形塑了埃塞国家。^②在国家整合中,传统精英“大人物”也与阿姆哈拉人画等号;这些人赓续传统,共享观念与价值,尤其是忠于所罗门王室。^③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族群的阿姆哈拉人既包括绍阿贵族,也囊括部分提格雷贵族、奥罗莫贵族。它并非以亲缘纽带为基础的族群,而是依托权力的族群。无论原本出身、地域,只要皈依东正教,认同所罗门王室统治,讲阿姆哈拉语,并将祖先追溯到所罗门世系,他就是阿姆哈拉人并获得进入精英权力网的资格。^④那些无法成为阿姆哈拉人的群体则应安于自身等级并接受阿姆哈拉统治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由此社会秩序才能正常运转。^⑤可以说,依托语言与历史神话,阿姆哈拉人建构了三位一体身份属性,将族群身份与等级秩序混而为一。

一方面,阿姆哈拉人依靠等级制进行自我整合。一是通过等级身份明确上下尊卑。孟尼利克二世时,除东正教神职人员,阿姆哈拉精英包括忠于皇帝的绍阿贵族与归顺贵族(提格雷、戈贾姆、奥罗莫等贵族)。其中,血统最尊贵的王族可享有“亲王”称号,身份可世袭。其他贵族统称“敕封贵族”,爵位与在政府中的职位对应。其中最高级的“公爵”可担任军事统帅;次一级“侯爵”可担任近卫军军官。孟尼利克二世堂兄、海尔·塞拉西皇帝的父

① John Markakis, *Ethiopia: Anatomy of a Traditional Polity*, pp. 29–30.

② Namhla Thando Matshanda, “The Contemporary Challenge of Citizenship in Ethiopia and the Role of Empire in the Making of Subject Populations”, in Suren Pillay ed., *On the Subject of Citizenship: Late Colonialism in the World Today*,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2023, p. 112.

③ [肯尼亚] B. A. 奥戈特主编:《非洲通史: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的非洲》(第五卷),第 554 页。

④ [美国] 萨义德·阿德朱莫比著:《埃塞俄比亚史》,第 40 页。

⑤ John Markakis, *Ethiopia: Anatomy of a Traditional Po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4, pp. 101–103.

亲马康南 (Makonnen) 就得到“公爵”封号, 而塞拉西进入权力中枢前曾任近卫军军官。归顺贵族可获封“伯爵”“子爵”, 分别对应右翼、左翼司令官。^① 若与王室联姻, 归顺贵族地位还可进一步提升, 如约翰尼斯四世的孙子塞约姆·曼加夏 (Seyoum Mengesha) 本为提格雷贵族, 但与绍阿阿特塞德公主 (Princess Atsede) 联姻, 得封“亲王公爵”。^② 阿姆哈拉平民则无法获得贵族头衔, 最高只能做到千夫长。^③

二是通过土地分配强化等级秩序。阿姆哈拉人重视土地权利, 这关乎其身份地位。王室、贵族与平民身份是土地分配与所有权的依据, 占有的土地反过来又规定了不同人群的身份。在税封领地制“古尔特”(gult)下, 王室拥有永久领地, 享有土地上一切权益, 包括土地上的劳动者。贵族、官员则享受作为薪酬与奖赏的临时领地。^④ 土地总管常驻领地, 代表王室、贵族、官员管理土地, 组织、监督农奴生产活动, 同时向附近自由民征收贡赋。自由民土地源自氏族分配, 这种地不能出售, 只享有使用权。若自由民无法按时缴纳贡赋, 将失去土地。^⑤ 对于阿姆哈拉自由民而言, 依托土地获得的身份是其担任公职的必要条件, 甚至可比肩最低一级贵族、牧师。若失去土地, 自由民不仅失去任职资格, 还将丧失阿姆哈拉人身份。而追随孟尼利克二世南征并获得古尔特的奥罗莫将士在习得阿姆哈拉语后可成为阿姆哈拉自由民。^⑥

另一方面, 阿姆哈拉人推广这种等级制, 强迫其他群体明晰各自在等级结构中的位置, 倒逼其群体身份的族裔化。一是提格雷人。由于文化、政治、社会传统相似, 阿姆哈拉人主要通过政治地位安排来规定提格雷人身份。据所罗门传统, 皇帝(万王之王)登基后会册封几个最强大领地, 如戈贾姆、瓦洛、贝格姆德 (Begemder)、提格雷领主为“领地之王”, 绍阿领主 18 世纪也得封领地之王, 这赋予其统治各自领地的合法性, 确立他们与皇帝的效忠关系。更重要的是, 获得领地之王身份意味着拥有问鼎帝位的资格。^⑦ 约翰尼

① John Markakis, *Ethiopia: Anatomy of a Traditional Polity*, p. 87.

② [英国] 理查德·格林菲尔德著:《埃塞俄比亚新政治史》, 第 322 页。

③ John Dunn, “‘For God, Emperor, and Country!’ The Evolution of Ethiopia’s Nineteenth – Century Army”, *War in History*, Vol. 1, No. 3, 1994, pp. 281 – 282.

④ John Markakis and Nega Ayele, *Class and Revolution in Ethiopia*, Trenton: The Red Sea Press, 1986, p. 22.

⑤ John Markakis, *Ethiopia: Anatomy of a Traditional Polity*, pp. 78 – 83.

⑥ Richard Pankhurst, “Tedla Hailé, and the Problem of Multi – Ethnicity in Ethiopia”, p. 89.

⑦ Bahru Zewde, *A History of Modern Ethiopia, 1855 – 1991*, Oxford: James Curry, 2001, pp. 13 – 14.

斯四世、孟尼利克二世称帝前都曾是领地之王。为了打压提格雷贵族，孟尼利克二世拒绝册封约翰尼斯四世之子曼加夏·约翰尼斯为提格雷领地之王，仅封其为公爵；忠于皇帝的瓦洛领主米卡勒（Mikaél）则兼领提格雷领地之王虚衔。这就增加了曼加夏治理提格雷的难度。^①由此，帝位在阿姆哈拉、提格雷领主间传递的规则被打破，提格雷贵族沦为依附皇帝的地方精英。为了维持对提格雷的统治，约翰尼斯四世后裔只能分别依附不同的所罗门王族成员。提格雷领主塞约姆·曼加夏因此不得不与两个儿子作战，毕竟后者也得到王族支持。^②正是因失去争夺帝位的资格，使提格雷人不同于阿姆哈拉人的独特身份凸显。他们自称是阿克苏姆文明的真正创造者，因未与奥罗莫人通婚而保持了“纯正”血统与文化，并将阿姆哈拉人贬低为“半盖拉人”。^③

二是奥罗莫人。孟尼利克二世吸收奥罗莫贵族，实现对奥罗莫地区的最终征服。19 世纪以来，阿姆哈拉人与奥罗莫人融合，前者深刻影响了奥罗莫社会组织形式。例如，以声望、地位、财富为标准的“大人物”认同逐渐取代奥罗莫人的盖达体系。奥罗莫贵族追求爵位、官职、荣誉，博取皇帝的赏识。同时，大量与地位、等级有关的阿姆哈拉词汇进入奥罗莫语，如“法官”“主人”等。^④奥罗莫女性也更愿意“上嫁”阿姆哈拉人，以提升娘家社会地位。^⑤但绝大多数奥罗莫人都沦为所罗门王室臣民，这些人在政治压迫、经济盘剥中其奥罗莫族群身份意识开始觉醒。在孟尼利克二世时，被征服的阿尔西（Arsi）、哈勒尔（Harar）等地奥罗莫人大批沦为农奴，承受繁重劳役。^⑥陷入普遍贫困的奥罗莫人还遭到阿姆哈拉人系统性歧视，后者粗暴践踏奥罗莫人的“瓦克凡纳”（Waaqeffanna）传统信仰与对“阿巴穆达”（意为“先

① [英国] 理查德·格林菲尔德著：《埃塞俄比亚新政治史》，第 236 页、270 页。

② 塞约姆·曼加夏为约翰尼斯四世之孙、曼加夏·约翰尼斯之子。参见 [英国] 理查德·格林菲尔德著：《埃塞俄比亚新政治史》，第 287 页。

③ John Markakis, *Ethiopia: Anatomy of a Traditional Polity*, p. 48.

④ [肯尼亚] B. A. 奥戈特主编：《非洲通史（第五卷）：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的非洲》，第 581 ~ 583 页。

⑤ [瑞典] 卡尔·埃里克·克努森：《分化与融合——埃塞俄比亚南部的族群关系面面观》，载 [挪威] 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李丽琴译，商务印书馆，2014 年版，第 84 页。

⑥ Mohammed Hassen, “A Short History of Oromo Colonial Experience 1870’s – 1990’s: Part One 1870’s to 1935”, *The Journal of Oromo Studies*, Issue. 6, No. 1 – 2, 1999, pp. 139 – 141; [瑞典] 卡尔·埃里克·克努森：《分化与融合——埃塞俄比亚南部的族群关系面面观》，第 79 ~ 80 页。

知”)的崇拜,并以国家法庭取代自治机构。^①东正教信仰、阿姆哈拉语都成为将奥罗莫人压在社会底层的无法逾越的藩篱。同时,在将传统盖达体系与伊斯兰信仰融合的过程中,奥罗莫人形成自身不同于阿姆哈拉人的独特身份。1963年,奥罗莫知识分子组建马查—图拉马协会(Mecha-Tulema Association),重新书写奥罗莫人作为一个独立“族群”的历史。锡达莫人(Sidamo)等群体也遭遇了类似处境。锡达莫贵族曾建立卡法(Kaffa)、贾涅罗(Janjero)等王国,他们在阿姆哈拉化之后进入统治精英阶层。20世纪初,锡达莫贵族皈依东正教,使用阿姆哈拉语,而绝大多数锡达莫平民同奥罗莫人一样沦为农奴。^②

三是索马里人。索马里人很早就形成了自身族群与宗教认同。19世纪末欧加登被埃塞占领后,当地索马里人继续保有自己的游牧文化、氏族传统与宗教信仰。在埃塞族群等级结构中,他们是充满异质性与对抗性的群体。在泛索马里主义影响下,欧加登索马里人更认同邻国索马里,期待与其他索马里人的联合。^③与之情况类似的还有阿法尔人(Afar),他们在语言、宗教、生活方式、政治组织等方面都更接近索马里人。16世纪大量阿法尔人加入艾哈迈德·格兰的军队,与埃塞作战。孟尼利克二世对阿法尔人的征服更多是为了控制贸易重镇哈勒尔,并不在意对当地人的同化与治理。^④

孟尼利克二世时期是埃塞历史一个分水岭。这一时期,不仅埃塞的现代领土空间基本定型,而且埃塞各群体身份也初步完成了族群化过程。等级确定了身份,“统治精英—地方精英—臣民—敌人”为埃塞各群体的自我与相互辨识提供了最直接依据。在此过程中,无法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大多数人立足自身社会地位,凝聚了族群身份认同,而族际分野最终赋予各族群身份以政治涵义。在孟尼利克二世时期最终定型的族群等级结构中,阿姆哈拉人是国家缔造者与支配者;提格雷人是不满阿姆哈拉人、试图提升地位的内部竞争者;奥罗莫人、锡达莫人是若即若离的臣民,他们不满自身在埃塞发

① Mohammed Hassen, “Islam as an Ideology of Resistance among the Oromo of Ethiopi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slamic Social Sciences*, Vol. 26, No. 3, 2009, pp. 100–101.

② Harold G. Marcus, “Imperialism and Expansionism in Ethiopia from 1865 to 1900”, in L. H. Gann and Peter Duignan eds.,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451.

③ 王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分离主义运动及其治理》,载《世界民族》2023年第2期,第56页。

④ Kassim Shehim, “Ethiopia, Revolution, and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ties: The Case of the Afar”,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23, No. 2, 1985, p. 332.

展中无关紧要的位置,但不得不把埃塞视为自身存在的外部依据;至于索马里人、阿法尔人,只是离心离德的被征服者与随时想要分离的敌对者,是难以融入埃塞国家的异质元素。

由此,埃塞族群历史等级结构具有鲜明的互构性。对阿姆哈拉人而言,“埃塞俄比亚没有非洲人”^①,他们漠视族际分野,不愿承认其他族群享有平等公民身份,而视其为低人一等的臣民。基于“我们”与“他者”的简单二元对立,奥罗莫人则将自身与“阿比西尼亚人”区分开,前者具有和平、民主、积极的价值观,后者相反。奥罗莫人不在意阿姆哈拉人与提格雷人的差别,将其笼统置于本群体对立面。^②同样,索马里人也更多把其他埃塞族群无差别地视为本族“敌人”,在凸显自身特性的同时,将包括奥罗莫人在内的埃塞人都视为“敌人”。^③不过,族群互构性在这一时期也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它促成了埃塞国家的基本框架结构,为国土空间内各种人群提供了基本政治与社会秩序。面对 20 世纪初复杂的国际局势,埃塞国家由此赢得各国对其新边界的承认,实现了一个非洲本土国家的存续。^④而在当时,绝大多数非洲王国都遭到毁灭性打击并沦为欧洲殖民地。可以说,互构性决定了各族群的相互依存与埃塞国家的初步整合。

三 埃塞族群历史等级结构的当代影响

埃塞族群历史等级结构形成以来经历了 4 个主要发展阶段,其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即 1930~1974 年海尔·塞拉西皇帝时期。这一时期族群等级结构继续由阿姆哈拉人主导。随着族群融合通道的堵塞,提格雷人、奥罗莫人、索马里人等族群间等级差异逐渐消失,而等级结构内在压迫性激发了各族群对其维护者所罗门王朝的反抗。第二阶段是 1974~1991 年德格时期。上台执政的德格看到了各族群不满情绪,执行了以国家为中心统摄国民、

① [日本] 栗本英世:《文化的地平线:现代非洲人的故乡》,包央译,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 109 页。

② John Sorenson, “Learning to Be Oromo: Nationalist Discourse in the Diaspora”, *Social Identities.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Race, Nation, and Culture*, Vol. 2, No. 3, 1996, pp. 454–455.

③ Fekadu Adugna, “Overlapping Nationalist Projects and Contested Spaces: The Oromo – Somali Borderlands in Southern Ethiopia”, *Journal of Eastern African Studies*, Vol. 5, No. 4, 2011, pp. 774–775.

④ 李安山:《非洲现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第 103~105 页。

消除族际界限的政策,却导致帝制时期遭压制的地方民族主义意识快速反弹,各族群离心倾向加剧,各地涌现出形式多样的族群武装团体,全国深陷族群冲突。第三阶段为1991~2018年埃革阵时期。以提格雷族群武装提人阵为首的力量推翻德格政权,联合各族群团体组建埃革阵,推行民族联邦制。这一时期,族群身份制度化,族群自治意识增强,他们普遍不满提人阵对权力的长期垄断。第四阶段是2018年以来繁荣党(Prosperity Party)时期。阿比·艾哈迈德上台后,将埃革阵改组为繁荣党,推行政治改革,倡导泛埃塞主义与族群和解,致力于打破族群的等级结构。

(一) 强制同化与族群历史等级结构的延续

以阿姆哈拉人为主导的族群结构在塞拉西皇帝统治时期得到进一步强化。在西方民族国家浪潮冲击下,塞拉西皇帝试图以阿姆哈拉人为主体的,抹杀其他族群身份、语言等“杂质”,打造埃塞单一民族国家。他效仿日、俄,强制要求各族群“阿姆哈拉化”,使用阿姆哈拉语,接受东正教信仰。1931年,帝国宪法以国家最高法形式规定埃塞国家认同就等于阿姆哈拉化。^①塞拉西皇帝同化埃塞多元族群的举措加剧了阿姆哈拉人与其他族群的二元对立。

一方面,信仰(东正教)、血统(所罗门)、族性(阿姆哈拉人)三位一体中的族性元素在国家整合中的重要性上升。其他族群通过皈依东正教、效忠所罗门王室实现阶层跃升、族群身份转变的渠道被堵塞。塞拉西时期“阿姆哈拉化”未能使其他族群变成阿姆哈拉人,只是凸显了阿姆哈拉人的特权身份。当时政府资源多投给阿姆哈拉人。1948~1966年间,中央高级官员中来自绍阿的阿姆哈拉人超过60%,奥罗莫人只有1~2人,索马里人则被排除在外。^②

另一方面,提格雷人、奥罗莫人、索马里人等族群的等级差异逐渐消失,无论地方精英、臣民还是敌人,现在都是所罗门王朝治下臣民。随着大规模扩张的停止与现代化进程的启动,以往还能在空间上扩大资源总量的王室如今转向在现有疆域内进行资源分配。其中,提格雷人是缴纳贡赋的农民,原先的奥罗莫、锡达莫农奴则成为农场、咖啡种植园的农民工。^③涌入首都等大城市的人群则充当熟练工、临时工。以往族群相对静态的空间分布如今被族

① [英国] 理查德·格林菲尔德著:《埃塞俄比亚新政治史》,第337~338页。

② Christopher Clapham, *Haile Selassie's Government*, London: Longmans Press, 1969, p. 77.

③ [美国] 萨义德·阿德朱莫比著:《埃塞俄比亚史》,第127页。

群流动打破,各族民众聚居在首都、地方中心城市,对阿姆哈拉政治、文化霸权感受更为真切。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除了原本分散各地的“族群叛乱”,城市中学生、工人、军人等职业型抗议也逐渐兴起。1974 年,该国军队推翻塞拉西政权,埃塞的帝制统治结束。

(二)“国家至上”与族群原子化

以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Mengistu Haile Mariam)为首的德格政权看到阿姆哈拉人对其他族群压迫带来的后果,试图以彻底消弭族群身份、打造全民国家的方式粉碎埃塞族群等级结构。据 1974 年政府发布的官方宣言,德格否认埃塞存在任何族群、语言、文化差异,强调作为埃塞国民的统一身份。^①由此,在理论上只有“埃塞民族”身份认同,而没有阿姆哈拉人、提格雷人、奥罗莫人、索马里人等族群身份。为推动社会改革与移风易俗,德格动员学校师生下乡宣扬全民平等新理念,即“泽马查运动”(意为“合作发展”)。^②据此,德格认为族群等级结构的问题已经解决,转而倡导全民建设国家的“国家至上”理念。^③不过,德格轻视了族群等级结构的顽固性,它在否定所罗门王室权威与阿姆哈拉化合法性的同时,切断以往联系各族群的纽带,民众失去对所罗门王室效忠的义务,迅速退回一盘散沙的状态。

一方面,埃塞各地族群更倾向自治乃至分离。1975 年德格废除帝制,通过土地国有化、工农业集体化瓦解族群等级结构赖以维系的经济基础。^④这使帝制时期遭到压制的地方民族主义意识快速反弹,族群自治乃至分离的鼓噪甚嚣尘上。厄立特里亚分离主义运动早在帝制时期就已兴起,德格时期快速壮大,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简称“厄人阵”)于 1975 年进逼首府阿斯马拉。在《我们的斗争及目标》(*Our Struggle and Its Goals*)中,厄人阵强调分离与独立建国是解决厄立特里亚问题的唯一出路。^⑤到 1977 年,埃塞全国 14 个地区都出现族群武装团体,如提格雷的提人阵,锡达莫、阿尔西等地的

① John W. Harbeson, “Socialism, Traditions, and Revolutionary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Ethiopia”,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Vol. 11, No. 2, 1977, pp. 224 – 229.

② Dawit Wolde Giorgis, *Red Tears: War, Famine and Revolution in Ethiopia*, Trenton: The Red Sea Press, 1989, p. 27.

③ John Markakis, *Ethiopia: The Last Two Frontiers*, pp. 175 – 176.

④ Göte Hansson, *The Ethiopian Economy 1974 – 94: Ethiopia Tikhedem and After*, London: Routledge, 1995, pp. 26 – 28.

⑤ Jennifer Riggan, *The Struggling State: Nationalism, Mass Militarization, and the Education of Eritre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43 – 45.

奥罗莫解放阵线（简称“奥解阵”），阿法尔的阿法尔解放阵线等。^① 欧加登索马里人更是仰赖邻国索马里支持，配合后者发动 1977 ~ 1979 年欧加登战争，试图分裂欧加登地区。德格期待的全民国家遥遥无期，它反被视为帝制继承人，承受来自各族群的压力。1983 年，德格不得不组建民族研究所，先后识别出 74 个族群，无奈承认多元族群的客观存在。^②

另一方面，德格力图以高压政策维护革命成果，最终蜕变为寡头军事集团。面对埃塞各地蜂起的冲突，德格政府内部有人曾提出和解方案，如阿曼·安东姆（Aman Andom）主张对话解决厄立特里亚分离主义问题。不过，德格拒绝族群标签，将各地冲突简单归为地方“叛乱”，回避冲突的族群症结。在“国家至上”旗号下，德格将对厄人阵的打击作为震慑各地“叛乱”的典型，不断加大军事压力，直到 80 年代发生“红星运动”（Red Star Campaign）。^③ 在各族群武装看来，德格的武力镇压只是帝制时期同化政策更为暴力的形式。^④ 在镇压各地“叛乱”与防范政权内异己分子的过程中，门格斯图统治日益寡头化、军事化。而各地族群武装与政府内反门格斯图力量埃塞人民革命党联合起来，构成内外夹击之势。其中，主张分离建国的厄人阵与主张取门格斯图而代之的提人阵是两支最强大的族群武装。尽管双方龃龉不断，但在 1991 年协力推翻了德格政权。

（三）民族联邦制与族群历史等级结构的变异

推翻德格政权后，提人阵主导的埃革阵承受了 1991 ~ 1993 年厄立特里亚从自治到最终独立引发的连锁反应。它需要建立联结各族群的新纽带，在维护埃塞国家统一的同时，避免重蹈德格暴力镇压的覆辙。它承认各族群身份与权利，反对阿姆哈拉人霸权，同时抵制各族群脱离埃塞的激进分离主义，倡导族群平等、自治与联合。据此，1992 年，埃革阵根据识别出的“民族”边界划定 12 个民族州与两个自治市。1995 年通过新宪法，正式确立以“各群体、民族与国民权利为基础”的民族联邦制。^⑤ 由此，埃革阵在法理上否定族

① [美国] 萨义德·阿德朱莫比著：《埃塞俄比亚史》，第 152 ~ 154 页。

② 施琳、牛忠光：《埃塞俄比亚民族关系与民族治理研究》，载《西亚非洲》2013 年第 4 期，第 25 页。

③ 肖玉华著：《当代埃塞俄比亚政治进程研究》，第 71 ~ 72 页。

④ Dawit Wolde Giorgis, *Red Tears: War, Famine and Revolution in Ethiopia*, pp. 61 - 63.

⑤ Mulatu Wubneh, "Ethnic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Administrative Units in Ethiop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opian Studies*, Vol. 11, No. 1 - 2, 2017, pp. 105 - 138.

群历史结构的等级性,各族群享有包括分离权在内的高度自治权,有权使用本族语言,选举州政府,管理州土地与资源。但联邦掌握监管各州财政的权力,分离权的落实需联邦政府主持公投、修宪,提高了族群分离主义的门槛与难度。^① 尽管埃革阵试图在分权与统一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但多元族群相互竞争的现实使埃革阵在施政中偏向维护国家统一,由此提人阵发展为凌驾于埃革阵内其他族群党的新权威,它对提格雷人利益的偏袒使埃塞族群结构的等级性以新的形式凸显出来。

一方面,民族联邦制将族群身份制度化,各族群围绕政治权力、经济资源与文化认同展开激烈博弈。^② 在民族州划界过程中,原本已长期混居并走向融合的奥罗莫人、阿姆哈拉人、索马里人等在本族占主导的地区驱逐“异族”,人为制造民族州内的族群“纯化”。在奥罗米亚州与索马里州划界中,几乎所有两族混居的边境城镇都要举行公投才能决定归属;像在莫亚莱(Moyale)等未能举行公投的地方,当地奥罗莫人与索马里人分别组建一套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由此造成极大的社会撕裂。^③ 以族群多元著称的南方州更是陷入族群恶性分化。该州古拉格人(Gurage)内各群体为争夺利益而人为推动族群分化,希尔特人(Silte)、基贝纳人(Kebena)、索多人(Soddo)放弃古拉格人身份,要求联邦承认其为独立“民族”。^④ 而在南方州北奥莫区(North Omo Zone),又存在沃莱塔人(Wolaita)、加莫人(Gamo)、格法人(Gofa)、道罗人(Dawro)、康塔人(Konta)等族群博弈,该区一度要同时使用4种官方语言,愈演愈烈的族际冲突最终迫使政府将该区细分为3个区与两个特区。^⑤ 21世纪以来,埃革阵倡导的“发展型国家”战略则在大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忽视对经济成果更均衡的分配,导致各族群围绕资源争夺的冲突白热化。

① 施琳:《应对民族多样性的“非洲思路”——“多维度”视域下的埃塞俄比亚民族治理模式》,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年第3期,第64~65页。

② Daniel N. Posner, *Institutions and Ethnic Politics in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58-259.

③ Fekadu Aduugna, “Overlapping Nationalist Projects and Contested Spaces: The Oromo - Somali Borderlands in Southern Ethiopia”, *Journal of Eastern African Studies*, Vol. 5, Issue 4, 2011, pp. 773-787.

④ Lovise Aalen, “Ethnic Federalism and Self - Determination for Nationalities in a Semi - Authoritarian State: The Case of Ethiop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inority and Group Rights*, Vol. 13, 2006, pp. 256-261.

⑤ Hone Mandefro and Logan Cochrane, “State Power and Citizen Agency: Reframing the Power Narrative in State - society Relations in Ethiopia”, in Jean - Nicolas Bach et al.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Horn of Africa*,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p. 271.

另一方面，提人阵违反埃革阵内族群党平等联合原则，塑造了上级党对下级党的垂直结构，在施政中又多为提格雷人攫取权益，引发其他族群不满。在埃革阵内，提人阵筛选其他族群党领导层并派遣“顾问”，事实上控制了阿姆哈拉民族民主运动（简称“阿民组”）、奥罗莫人民民主组织（简称“奥民组”）等党派。某种意义上，这些族群党都成了提人阵在各民族州的代理人。^① 提人阵还打压反对党，确保埃革阵内各族群党在各州的执政地位，形成了虽保留定期选举等民主元素、但由提人阵实际垄断权力的政治体制。在联邦与地方选举中，提人阵通过胁迫、贿赂等方式挤压奥解阵、埃塞人民革命党、全体阿姆哈拉人民组织等反对党票源，设法迫使其退出竞选。^② 同时，提人阵大力维护提格雷人权益。在民族州划界中，它将原属阿姆哈拉州的韦尔凯特（Wolkait）、卡夫塔—胡梅拉（Kafeta-Humera）、塞格德（Segede）等县划归提格雷州，当地5万多阿姆哈拉居民被迫迁离。^③ 提人阵还依托提格雷重建捐赠基金（Effort）将大量国家资金投入提格雷工农业发展，投资比例远高于其他州。仅占埃塞人口6%的提格雷人却占据着大量联邦军政职位；执政前期，提格雷军官甚至占政府军军官总数的70%。2012年，出身提格雷人的总理梅莱斯去世后，提人阵专门挑选出身南方小族沃莱塔人的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Hailemariam Desalegn）担任总理，以便控制局势。^④ 同时，近40名提格雷军官获突击晋升，武装部队参谋长、情报部长、外交事务主管等实权职位皆由提格雷人担任。在阿姆哈拉地方民族主义者看来，这是提格雷人有预谋地取代阿姆哈拉人的计划。在奥罗莫地方民族主义者看来，提格雷人是埃塞族群等级结构中的新压迫者，与以往阿姆哈拉人别无二致，奥罗莫人始终被“高地族群”压迫，唯有暴力斗争才能改善自身处境。^⑤ 2014年，

① Jon Abbink, “The Ethiopian Second Republic and the Fragile ‘Social Contract’”, *Africa Spectrum*, Vol. 44, No. 2, 2009, pp. 7–9.

② Kassahun Berhanu, “Party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Ethiopia”, in M. A. Mohammed Salih ed., *African Political Parties: Evolution, Institutionalisation and Governance*, London: Pluto Press, 2002, pp. 119–121.

③ Alene Kassaw and Mbabazi Veneranda, “TPLF’s Annexation of Wolkait, Ethiopia: Motivations, Strategies, and Interests”, *Cogent Social Sciences*, Vol. 10, No. 1, 2024, pp. 6–13.

④ Juneydi Saaddo, “Behind the Ethiopia Protests: A View from Inside the Government”, *African Arguments*, September 16, 2016, <https://africanarguments.org/2016/09/behind-the-ethiopia-protests-a-view-from-inside-the-government/>, 2025–02–12.

⑤ Semir Yusuf, *Drivers of Ethnic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Ethiopia*, Pretoria: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2019, pp. 22–23.

奥罗莫人因不满侵占本州土地的“亚的斯亚贝巴总体规划”而举行抗议，引发蔓延全国的抗议浪潮。埃革阵内阿民组、奥民组趁机削弱提人阵。内外交困中，海尔马利亚姆·德萨莱尼被迫于 2018 年 1 月辞职，奥民组与阿民组推举出身奥罗莫人的阿比·艾哈迈德担任新总理。

（四）族群和解、团结与泛埃塞主义

2018 年 4 月阿比接任总理。他试图复制卢旺达“去族群化”模式，提出淡化族际分野、强调国家认同的泛埃塞主义与“梅德默理念”（意为“团结”），呼吁以虔诚信仰、真诚对话弥合族群矛盾，倡导理解、爱与宽恕。阿比致力于寻求共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打破顽固的族群等级结构，维护国家统一。^① 2019 年他进一步将埃革阵改组为单一制政党繁荣党，革新“半威权主义”体制，携手各族群共同推进政治改革。

尽管阿比倡导族群平等、团结、和解，但繁荣党在改组中排除了埃革阵前主导党提人阵，其他族群尤其是阿姆哈拉人趁机“反攻”提格雷人。2018 年 6 月，阿姆哈拉地方民族主义者组建反对党阿姆哈拉民族运动（National Movement of the Amhara, NaMA），领导人贝莱特·莫拉（Belete Molla）鼓吹在阿姆哈拉州与提格雷州有争议土地问题上采取激进措施。^② 沃莱塔地区 2018 年底则要求公投脱离南方州，另组沃莱塔州。2019 年当地人组建鼓吹激进自治的沃莱塔民族运动（National Movement of Wolayta）。^③ 阿姆哈拉、奥罗米亚、本尚古勒—古马兹（Benshangule – Gumaz）等州还发生针对其他族群的暴力排外事件，导致数百人丧生。^④ 感到被孤立与“清算”的提人阵以提格雷州为基地于 2020 年底挑起反对阿比政府的战争。在 2022 年底签署停火协议前，战争波及提格雷州、阿姆哈拉州、阿法尔州、奥罗米亚州等广大地

① “‘Medemer’”, by Abiy Ahmed, Ph. D., An Interpretive Book Review in Two Parts (Part I)”, *Almariam*, October 20, 2019, <https://almariam.com/2019/10/20/medemer-by-abiy-ahmed-ph-d-an-interpretive-book-review-in-two-parts>, 2025-02-12.

② Tezera Tazebew, “Amhara Nationalism: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African Affairs*, Vol. 120, No. 479, 2021, pp. 297-298.

③ Minyahil Tadesse Boltana, “It’s Time to Respect the Wolayta People’s Constitutional Rights”, *Ethiopia Insight*, August 28, 2020, <https://www.ethiopia-insight.com/2020/08/28/its-time-to-respect-the-wolayta-peoples-constitutional-rights>, 2025-02-12.

④ Jon Abbink, “The Looming Spectre: A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Emergency’ in Ethiopia, 1970s-2021”, p. 309.

区，导致至少 200 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国内通胀率突破 30%。^① 随后，提人阵与提格雷州临时政府就权力分配产生分歧，2024 年 9 月提人阵主席德布雷齐翁·加布雷迈克尔（Debretsion Gebremichael）开除临时政府首脑格塔丘·雷达（Getachew Reda）等多名政府官员党籍，提格雷人内部分离派与联邦派矛盾激化。^② 同时，提格雷战争中曾支持阿比的阿姆哈拉民兵“法诺”（Fano）与地方特种部队等不满政府向提人阵让步，转而与政府军爆发冲突。^③ 奥解阵也趁机扩大在奥罗米亚州的袭击。^④ 面对各地族群暴力事件，阿比通过与提人阵保持接触、宣布阿姆哈拉州进入紧急状态、派军进驻奥罗米亚州等有针对性的举措加以应对，尽力维护地区稳定与国家统一。

阿比执政以来，各类族群问题都可视为族群历史等级结构下长期积聚矛盾的爆发。除了打击族群武装势力，阿比着重采取以下两方面的举措，破除族群等级结构。一方面，倡导宗教包容，推进族群和解。2019 年，阿比在首都千禧年大厦演讲，强调在一个 99% 的国民都信奉上帝的国度中，唯有“埃塞上帝”能带给国家繁荣。^⑤ 在 2021 年复活节演讲中，阿比将提格雷战争的僵局比作基督受难，鼓励国民克服困难，增强团结。^⑥ 与此同时，阿比调解埃塞东正教会与奥罗莫地区教会矛盾，满足了奥罗莫人使用本族语言礼拜的诉求；他还调解埃塞伊斯兰事务最高委员会与穆斯林仲裁委员会的矛盾，结束双方长期对抗。此外，阿比推动成立埃塞福音派委员会，满足占全国人口近

① Obi Anyadike, “Boom to Bust: Fallout of War and Drought Leaves Ethiopians Mired in Poverty”, *The New Humanitarian*, August 1, 2023, <https://www.thenewhumanitarian.org/news-feature/2023/08/01/boom-bust-fallout-war-and-drought-leaves-ethiopians-mired-poverty>, 2025-02-12.

② “TPLF Revokes Membership of Key Leaders; Getachew Reda among 16 Ousted in Political Shake-up”, *Addis Standard*, September 17, 2024, <https://addisstandard.com/tplf-revokes-membership-of-key-leaders-getachew-reda-among-16-ousted-in-political-shake-up>, 2025-02-12.

③ Adem Kassie Abebe, “Ethiopia’s Amhara Conflict Could Spark Civil War”, *Foreign Policy*, March 6, 2024,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3/06/ethiopia-amhara-conflict-civil-war>, 2025-02-12.

④ Fred Harter, “As Violence Subsides in Tigray, Ethiopia’s Oromia Conflict Flares”, *The New Humanitarian*, January 12, 2023, <https://www.thenewhumanitarian.org/news-feature/2023/01/12/Ethiopia-Oromia-conflict-OLA>, 2025-02-12.

⑤ Jörg Haustein and Dereje Feyissa, “The Strains of ‘Pente’ Politics: Evangelicals and the Post-Orthodox State in Ethiopia”, in Jean-Nicolas Bach et al.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Horn of Africa*,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p. 488.

⑥ Terje Østebø, “Religious Dynamics and Conflicts in Contemporary Ethiopia: Expansion, Protection, and Reclaiming Space”,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66, No. 3, 2023, pp. 721-744.

20% 的福音派信众的诉求。^① 阿比试图凸显宗教共识, 淡化族群差异, 依托宗教推进族群团结。

另一方面, 阿比政府改善宏观经济环境, 以期增进各族群发展机会。2020 年, 阿比政府发布报告——《国内经济改革议程: 通往繁荣之路》, 提出以宏观经济与金融改革、吸引外资、农业发展为支柱的新经济规划, 试图改善过去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② 在金融领域, 阿比政府相关部门调整汇率、利率, 使埃塞比尔对美元贬值超过 50%, 一定程度上遏制了 2020 年以来失控的通胀率。2024 年, 该国参与“二十国集团共同框架”, 完成对国内 84 亿美元债务的重组。^③ 同时, 政府向外国投资者开放电信、金融、咖啡等部门。当年 10 月, 国有埃塞电信出售 10% 股份, 深化埃塞证券交易市场的发展。^④ 2025 年以来, 埃塞与中国、沙特等签署一系列投资协议, 覆盖农业、制造业、旅游业。^⑤ 在农业领域, 政府扩大各族群农户在租赁土地上的权利, 同时提供现代化金融、技术服务, 促进小农增收, 稳定农业发展。通过一系列经济改革, 埃塞通胀率已从 2022 年 32.5% 降至 2025 年初 20.7%, 同期经济增长率从 7.9% 增至 8.5%。^⑥

以此为基础, 阿比进一步优化经济布局, 增进各地区各族群发展机会。2021 年以来, 阿比政府针对地区、族群发展不均衡问题进行改革。一是因地

① Elle Hardy, “Presiding Over Ethiopia’s Five Conflicts”, *New Lines Magazine*, February 1, 2023, <https://newlinesmag.com/reportage/the-religious-zealot-presiding-over-ethiopias-five-conflicts>, 2025-02-12.

② Federal Democratic Republic of Ethiopia, *A Homegrown Economic Reform Agenda: A Pathway to Prosperity*, March 2020, pp. 2-3.

③ Herald Aloo, “Can Ethiopia Break its Debt Deadlock with Creditors?”, *The Africa Report*, April 11, 2025, <https://www.theafricareport.com/381348/can-ethiopia-break-its-debt-deadlock-with-creditors>, 2025-04-15.

④ Liam Taylor, “Ethiopia’s Precarious Economic Reforms”, *Foreign Policy*, December 19, 2024,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12/19/ethiopia-economy-reform-abiy-currency-finance-exchange-rate/>.

⑤ 刘方强:《中国—埃塞经贸论坛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 载新华网: <https://www.news.cn/20250225/da4ccd7d8d6f445a825a5ee789067e94/c.html>, 2025-04-12; Mohammed Al-Kinani, “Saudi Arabia, Ethiopia Target Key Sectors in Push to Deepen Economic Ties”, *Arab News*, April 23, 2025, <https://www.arabnews.com/node/2598153/business-economy>, 2025-05-12.

⑥ Tatiana Mossot, “IMF Executive Board Completes the Second Review under the Extended Credit Facility (ECF) Arrangement for Ethiopia”, IMF, January 17, 2025, <https://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25/01/17/pr25006-ethiopia-imf-executive-board-completes-second-review-ecf-arrangement>, 2025-02-12.

制宜,充分挖掘各地发展资源。在复兴大坝所在的本尚古勒—古马兹州,联邦政府制订水库、河道渔业经济带发展规划。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该州已建立64个渔业经营协会,渔业日产量突破1.45万公斤,不仅丰富了当地居民食品供应,而且新增1600多个就业岗位。^①为了推动大量奥罗莫青年劳动力的本地化就业,阿比政府于2024年启动了由中国中土集团承建的加达经济特区(Gada Special Economic Zone)建设项目。该特区距亚的斯亚贝巴65公里,位于莫焦(Mojo)、阿达玛(Adama)与沙舍摩内(Shashemenne)三市交界地。特区不仅发展制造业,而且附带一个商业中心,以推动服务业就业。^②另外,阿法尔州碘盐生产厂、小麦加工厂等项目也已启动。^③二是建设跨国走廊,促进全国经济整合。2023年,阿比政府在拉穆港—南苏丹—埃塞运输走廊项目上取得进展,已与肯尼亚签署电力互联协议。走廊沿线奥罗米亚州、锡达莫州交通状况与民生有望得到改善。^④另外,阿比开辟了联通索马里柏培拉港(Berbera)走廊,深化亚吉铁路沿线产业发展等举措,也将惠及索马里州、阿法尔州民众。

从德格到埃革阵,不同执政者都试图革新埃塞族群历史等级结构,破除阿姆哈拉中心主义与文化霸权。在此过程中,埃塞各族群获得了国家认可的族群自治权。不过,作为革命者上台的提人阵最终把提格雷人推上原本属于阿姆哈拉人的主导位置,此举遭到其他族群不满与反抗。阿比执政之初,埃塞国内兴起“阿比热”(Abiymania),许多民众期待他能够快刀斩乱麻,妥善处置埃塞各类矛盾。提格雷战争后,随着阿比政府收紧安全政策,很多人又

① “Ethiopia’s Grand Renaissance Dam Sparks a Fish Production Boom: Boosting Daily Harvests & Local Growth”, *The Farmer’s Journal Africa*, March 29, 2025, <https://thefarmersjournal.com/ethiopia-s-grand-renaissance-dam-sparks-a-fish-production-boom-boosting-daily-harvests-local-growth>, 2025-04-12.

② “PM Abiy Launches Construction of Gada Special Economic Zone in Oromia”, ENA, May 10, 2024, https://www.ena.et/web/eng/w/eng_4415610, 2025-02-12.

③ Christina Glazkova, “Ethiopia’s PM, First Lady Inaugurate High-Capacity Bread Factory in Afar”, Sputnik News, March 24, 2025, <https://en.sputniknews.africa/20250324/ethiopia-s-pm-abiy-and-first-lady-inaugurate-high-capacity-bread-factory-in-afar-1071247050.html>, 2025-05-12.

④ 2019年11月,阿比接受地方公投结果,允许锡达莫州脱离南方州,成为埃塞第十个民族州。See Amenya Ochieng, “Lamu-Garissa Highway Set for Completion by February 2025 to Boost LAPSET Corridor”, *Kenya News Agency*, May 17, 2024, <https://www.kenyanews.go.ke/lamu-garissa-highway-set-for-completion-by-february-2025-to-boost-lapsset-corridor>, 2025-02-12.

批评他重蹈以往集权主义者覆辙,指责他打开了族群冲突的“潘多拉魔盒”。^①无论如何,顽固的族群历史等级结构给埃塞国家共同体建设带来的挑战不容小觑,但阿比已经着手加以解决该问题并取得初步成果。他倡导泛埃塞主义与族群和解,正是要打破历史遗留问题,探索和谐、合作的新型族群关系模式。^②

四 余论

一般而言,在多族群国家形成过程中,国家权力与经济关系规定了族群关系的内涵。随着埃塞国家快速扩张与成型,周边群体被吸纳与塑造,并对埃塞族群关系产生影响。20 世纪初,社会阶层流动的渠道基本被堵塞,埃塞族群的历史等级结构由此定型。其内在历史延续性加剧了精英阶层的封闭与固化,也使绝大多数人困于自身阶层(族属)带来的族群文化对立与政治敌视之中。

德格、埃革阵、繁荣党历届政府虽然都致力于变革埃塞族群历史等级结构,但其仍对当前埃塞国家治理产生一定影响。一是族群矛盾与政治经济资源分配不公带来共振效应。阿比执政以来,奥罗莫人、索马里人、阿姆哈拉人等都要求解决埃革阵时期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但资源补偿不可能一蹴而就,且有赖于继续扩大经济总量的努力。围绕这一问题的意见分歧乃至冲突极大牵扯了阿比政府的精力。二是族群冲突增加了安全治理成本。阿比倡导梅德默理念,一些地方民族主义者将其视为对族群自治权的侵蚀,^③并诱发 2020 年以来提格雷、阿姆哈拉、奥罗米亚等地暴力冲突。阿比不得不将本应用于发展的资源投入安全治理。2023 ~ 2024 年度埃塞安全预算占财政支出 11.8%,除了国防开支,政府用于国内安全治理的司法安全支出达 180 亿比尔(约合 2.2 亿美元);2024 ~ 2025 年安全预算增至财政支出的 15.6%,司

^① Mehdi Labzaé, “The War in Tigray (2020 – 2021): Dictated Truths, Irredentism and déjà – vu”, in Jean – Nicolas Bach et al.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Horn of Africa*,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p. 249.

^② Jos Meester, Guido Lanfranchi, and Tefera Negash Gebregziabher, *A Clash of Nationalism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Ethiopian Stat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thiopia's Transition*, Hague: Clingendael Institute, 2022, pp. 58 – 61.

^③ Faisal A. Roble, “Why Somalis Reject the Prosperity Party”, *Wardheer News*, April 5, 2023, <https://wardheernews.com/why-somalis-reject-the-prosperity-party>, 2025 – 02 – 12.

法安全预算达 276 亿比尔（约合 3.3 亿美元）。^① 三是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滋长加剧国家建构的难度。阿比倡导以泛埃塞主义推进族群和解与国家建构。但有人认为，泛埃塞主义只是以往同化其他族群的阿姆哈拉化政策的改良版。^② 奥罗莫青年团体“奎罗”（Qeerroo）更是断言，泛埃塞主义只是阿姆哈拉文化霸权的变体，缺乏对奥罗莫人权益的尊重。^③ 四是族群问题有国际化的风险。阿比积极改善与周边邻国关系，推进与厄立特里亚和解，结束两国长达 20 多年的敌对。2024 年 1 月，埃塞又与索马里兰地方政府签署柏培拉港口合作开发协议，推进国家进出口多元化战略。但提人阵指责阿比改善与厄立特里亚关系意在围堵提格雷人，抨击厄立特里亚军队在提格雷战争期间的介入。^④ 而欧加登索马里人也不满阿比与索马里兰地方政府的合作，认为阿比意在挑动索马里人内部分歧。^⑤ 的确，埃塞与索马里兰地方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或将承认索马里兰“独立”，是有损于索马里国家主权之行为。

英国的埃塞历史学家理查德·格林菲尔德（Richard Greenfield）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曾提醒说，“对于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完成和发展民族统一的过程，人们还存在分歧，这是当代埃塞俄比亚国内问题的核心。”^⑥ 阿比执政以来，没有回避族群历史等级结构带来的挑战。他在打击族群暴力分离主义、推动族际对话与和解的同时，推动经济增长与各族群更均衡发展，努力促成平等互惠的族群关系，依托泛埃塞主义寻求埃塞国族认同的最大公约数。未来，阿比还需更明确地向国民展示平等、团结、共赢的新型族群关系愿景，推进埃塞国家共同体建设。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史晓曦）

① *Ethiopia: Highlights of the 2024/25 Federal Government Budget Proclamation*, Addis Ababa: UNICEF, 2024, p. 5.

② Jan Zúhorík, Aleksi Ylönen, and Jonah Lego, “Multiple Layers of Pan-Africanism and Pan-Ethiopianism in Current Debates on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in Ethiopia”, *Nationalities Papers*, 2025, pp. 1–16.

③ Thea Forsén and Kjetil Tronvoll, “Protest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Ethiopia: The Initial Success of the Oromo Qeerroo Youth Movement”, *Nordic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Vol. 30, No. 4, 2021, pp. 13–15.

④ 王涛、杨昊东：《埃塞俄比亚提格雷人问题的多重面向》，载《世界民族》2024 年第 2 期，第 84~85 页。

⑤ Nisar Majid and Khalif Abdirahman, “State Fragmentation and New State Imaginaries: Maritime Access in the Horn of Africa”, *Peace Rep*, October 31, 2024, <https://peacerep.org/2024/10/31/state-fragmentation-and-new-state-imaginaries>, 2025-02-12.

⑥ [英国] 理查德·格林菲尔德著：《埃塞俄比亚新政治史》，第 227 页。

advantages in resource allocation within Kenya's ethnopolitical landscape.

Key words: ethnic identity; Kenya; Maasai; colonialism; African indigenous rights movement

Historical Hierarchy of Ethnic Group in Ethiopia and Its Contemporary Consequences

Wang Tao & Huang Shishun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hierarchy of ethnic group in Ethiopia has defined the power dynamics between ethnic groups. Its inherent confrontational and zero – sum mindset has profoundly impacted the nation – building process in Ethiopia, serving as a crit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ethnic conflicts.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the Solomon Dynasty integrated various groups into a common political space, shaping an ethnic hierarchy centered on the Amhara. The Amhara was the dominant elite, the Tigray was the local elite, the Oromo was the royal subject, and the Somali was the subjugated adversar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hierarchical differences of “elite – subject – adversary” promoted the ethnicization of the identities of various groups. Haile Selassie implemented forced assimilation policies, which triggered resistance from other ethnic groups. The Derg regime accelerated de – ethnicization, but it led to centrifugal ethnic tendencies and ethnic armed groups. After overthrowing the Derg regime, the TPLF achieve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thnic identity as to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ethnic federalism, heightening ethnic autonomy consciousness. However, other ethnic groups were dissatisfied with the long – term monopoly of power by the TPLF. The mentality of inherent antagonism and zero – sum has profoundly impeded national integration, constituting a critical lens for understanding current inter – ethnic conflicts. After Abiy Ahmed came into power in 2018, he fought against ethnic separatist forces, promoted political reforms, advocated for Pan – Ethiopianism and ethnic reconciliation, and worked to eliminate the influence of historical hierarchy of ethnic group.

Key words: nation – building; Ethiopia; historical hierarchy of ethnic group; Amharization; ethnic federalism; Pan – Ethiopianism